

# 钩沉香江

——抗战题材长篇小说《归途》创作札记

■古 风

## 创作谈



1996年为迎接香港回归,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计划把抗日战争期间香港沦陷的过程拍成电视剧,我应邀参与了策划和最初的剧本创作。正是从那时起,我便与“东江纵队”“香港抗战”产生了无法割舍的情感联系,直到完成长篇小说《归途》,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回头看看,已过去近30年,一时间不免感慨万千。

写这部小说的动机,是我在研究香港抗战的资料时,发现“营救”这个词极为突出。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日军全面进攻香港。驻港英军自信十足地告知香港民众,香港不可能在短期内被日军占领。结果,1941年12月25日圣诞节当天,日军攻陷香港,时任港督杨慕琦向日军投降。驻港英军仅仅抵抗了18天。此后,香港在日寇统治下进入3年零8个月的黑暗岁月。

香港沦陷后,大量英国军人成了战俘,被关押在不同的集中营里。此时香港还有近千位中国内地文化名人滞留。当年,许多作家、记者、导演、演员和反战士人为躲避战火逃亡至香港,如茅盾、邹韬奋、蔡楚生、胡

蝶等。同时,支援香港的美国空军飞虎队成员也有多人因战机被击落而隐藏在香港。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此时的重要任务就是营救这些滞留人员到解放区或者国统区的安全地带。因此,描述香港抗战,“营救”是非常重要的题材。

我在近30年的创作过程中完成的电影剧本《克尔记忆》、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港九大队》,以及今年出版的这部长篇小说《归途》都与当年香港地区的“营救”有关。

《归途》主人公诺亚是被游击队和普通香港民众护送的一位美国大兵。他的归途,就是一段被无数善意托举的旅程。如果说诺亚的归途是线,那么其他人物就是线上的珍珠。

小说创作伊始,在我最早的大纲里,包括主人公诺亚、游击队长梁波在内的,那些英雄们都是近乎完美的角色。他们沉着、勇敢、技艺高超,有着深深的国仇家恨和强烈的英雄情感。他们满怀正义和对日本侵略者的仇视参与到抗日战争中。但我偶然间读到一份美军飞行员日记,记录着他用口袋里几颗有些融化的太妃糖,作为和村里孩子破冰的礼物。这一行不起眼的文字,深深吸引了我。我忽然想知道,那场宏大的战争背后,这些具体的、带着体温的瞬间,究竟是什么样的。

后来,当我看到那些战争中具体而微的细节时,我恍然悟到:一切宏大本质上都是由微小构成的,大道义往往出自小情节,大作为都是由小举动组成,英雄也大多由普通人构成。

在我读到的资料里,有战士们当年的日记,有对老战士们采访,也有他们所写的回忆。这些材料让我看到更多历史细节:他们会记下腿伤溃烂时闻到的草药味,会清晰描述某个村民递过来一块红薯时手上的茧子,以及被陌生人救助后的笨拙感激。

所以,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修改了最初诺亚英勇无畏的形象,让

他成为一个“馋嘴中尉”,让他怕黑,让他在山洞里因为疼痛和恐惧而发抖。我给游击队长梁波设计的形象,是一个地方武装领导者。为了隐蔽身份,他戴着银戒指,使用象牙筷子,吸特制的烟斗……另外,我也想通过这些细节,让这个人物形象更有烟火气息。

小说中有一个情节,写12岁的游击队队员陈树。他作为情报员和传令兵,连续几天都没有睡觉,也顾不上吃东西。在一次战斗中,他埋伏在山岗上,却沉沉地睡着了。直到战斗结束,战友们清点队伍时,才在阵地上找到他。这个情节是我在广州采访一位东江纵队老战士时听到的。我在写作这段的时候,一边笑,一边流泪。这是我们可爱的英雄,但他也还是弱小的孩子。

我觉得正是这些细节的存在,才让书中众多英雄人物所做的一切,显得那么珍贵。游击队队员们并非单纯的“拯救者”,他们本身也是需要被拯救的、活生生的人。战争逼着这些善良无辜的人们拿起了枪。如果不是日军的侵略,梁波会是造船厂的工程师,陈树也会是一个普通渔民的儿子,还有中药铺掌柜、大学毕业生、医学博士……无数普通人,都在一夜之间被卷入了这场残酷的战争。如果不赶走侵略者,他们就不会过上正常的生活。

写他们的时候,我常常要跟自己“想当然”的冲动博弈。比如梁波,我总想让他说点铿锵有力的台词,但后来我放弃了,让他大部分时间沉默,只用行动说话。看到诺亚的伤,他默默叫人去抓药;面对怀孕的妻子,他把叮囑咽回去,只投去一个眼神。这种“收着写”的方式反而让他更有力量。

最让我煎熬的,是写牺牲。书中人物的牺牲极为壮烈。但如何表达这种壮烈,让这些壮烈能够触动灵魂,是我需要思考的事。所以,这些段落我

写得很慢,经常写几句就要停下来。最后,我依然选择了一种“克制”的写法。陈树的哥哥陈山跟着梁波和队员们去炸日军机场的油库时,被日军打死。失去好兄弟的梁波一行悲痛万分。他们逃出机场后,面对火光冲天的油库,默默无语。赶到现场的陈树得知哥哥牺牲的消息后,流着泪继续送信。

战争的残酷,不就在于这种突如其来、不容分说的“失去”吗?当我写到战友们围坐在篝火边怀念牺牲的同志时,他们一开始都是沉默的,随后,有人低声唱起了队歌,缓慢而激昂,这种悲壮无需豪言壮语。

我不想用悲情去煽动什么,只想让这份沉默的力量,重重落在纸上,也落在读者心里。

书里的一些小物件,在我写作过程中,常常像是自己跳出来的。那双筷子,最初只是为了形成文化符号,后来越写越觉得,它承载的东西变多了。从江娇逸出时的祝福,到诺亚笨拙地使用,再到几十年后艾米丽在箱底重新发现它。由这件最初的礼物上,我们看到一段被压缩的时间。梁波手上那枚刻满横道儿的烟杆,既是战绩簿,也是一个人的过往。同样,那些太妃糖、戒指、手表、磁靶等物件,它们在故事里生长,最后成为比台词更有力的语言。

写到尾声,我忽然明白了。我写的不只是一个关于过去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记忆如何活着”的故事。那些在抗战烽火中被打捞起来的人性光辉,并没有熄灭。它们通过一双筷子、一个故事、一个名字,悄无声息地流淌下来,流到了今天。

写《归途》,对我而言是一次灵魂的沐浴,也是一次人性的触碰。我希望读者能透过这些文字,看到战争的伤痕,并触摸到那些伤痕之下,普通人身上的坚韧与温情。那或许就是我们在绝境中,能真正依赖的“光”。

## 新书架



《学思平治——名家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出版社)一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精选若干专家学者文章,围绕新质生产力、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金融等重要议题,从特征、改革、发展、保证四个维度,系统阐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意义及实践路径,为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提供了有益参考。



## 长征

第6620期

## 文学赏析

岑参,是盛唐杰出的边塞诗人。他的诗作有胡天白雪的异域情调,也有空阔苍凉的边塞情怀,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岑参曾两次从军到边塞。公元749年,岑参随唐朝名将高仙芝出塞,辗转安西、武威等地,直到高仙芝兵败还朝。公元754年,岑参进入封常清幕府,再次出塞,直到安史之乱中,扈从唐肃宗回到长安。两次塞外经历,让岑参见惯了胡天白雪、兵戎激越。无论是送友人征战的离愁别绪,还是奇俊壮阔的胡天风光,岑参的诗与将士们的身心融为一体,在诗意画面里,呈现家国情怀。多年的军旅生活和对边塞风物的了解,促使岑参创作了一首首慷慨壮逸的边塞佳作。

岑参在《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诗中写送封常清出征的情境:“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白雪与黄沙交织出一派混沌的景象,狂风怒卷,迷迷蒙蒙。而比暴雪飞沙更加险恶的,是冰天雪地里战争。那是残酷的生存挑战,也是视死如归的军人风骨。可以说,全诗语意奇崛,风沙遮天蔽日、战势迫在眉睫、战况刻不容缓,以及征战的严峻考验,众多意蕴相融,一气呵成,让人读出坚不可摧的雄浑气概和豪迈的报国情怀。

岑参在另一首《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诗里写道:“天山雪云常不开,千峰万岭雪崔嵬。北风夜卷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雪中何以赠君别,惟有青青松树枝。”诗里的雪云与松枝,构成黑白色基调,在凝重的寒气和令人生畏的北风里,可见戍边生活的艰苦。面对边塞奇寒,岑参笔下却绝无怨天尤人之意,而是表现得极富激情,呈现出凛然不催的志士风采。

为大多数读者所熟知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开篇即写“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未提及白雪而先写风声,大雪倏然随风而来。紧接着“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将胡天白雪的飞舞景象,比作春风梨花的美丽景致,以南方春景喻北国风光,新颖贴切,让人称奇叫绝,成为中华文化中绵亘千古的胡天风情。诗中“纷纷暮雪下辕

# 岑参笔下白雪歌

■鲍安顺

门,风掣红旗冻不翻”一句,写白雪背景里的红旗。这一暖色,在苍茫雪景中显得格外绚丽,衬托出威武不屈的将士形象。

诗的最后,“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为“武判官”安排了壮阔的送别环境。“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将诗人的视线和心绪延伸向广远的天地,祈愿“武判官”在酷寒恶劣的天气,战胜长途跋涉的艰辛,平安归京。全诗抒写塞外送别,却并不伤感。岑参以瑰丽浪漫的色彩和浑然磅礴的气势,传递出将士们乐观激昂的战斗情绪。

1935年,红军长征过境天水。当地乡亲挥别红军时,以岑参诗句“去马疾如飞,看君战胜归”书于匾额相送。今日观之,依然光彩绽放。

回首历史苍苍春秋,遥望边疆万里山川,想象岑参当年,面对风急雪阔、三军大呼,笔下雪黄沙,映衬将士出征时的豪迈肝胆。今日捧卷重读,依然可见一股荡气回肠的英雄气。

## 冬日读书

■谢祥涛

## 读书生活

窗外的北风又开始使劲了。屋外寒风萧萧,拍打着玻璃,像是催促着什么。屋内因为有了暖气的缘故,只需一件薄毛衣,一杯刚刚好的热茶,就足以抵御冬日的严寒。若是再加上一部喜欢的读物,就能让人更感到身心放松。

退休后,我最享受的,就是这样冬日的午后。

记得年轻时,我所在的部队驻地在北方,冬天是真难熬。天寒地冻的时候,我们一群小伙子挤在营房里,最大的乐趣就是抢书看。一本不知被多少人传阅过,翻得卷了边的《高山下的花环》,或是一套残缺的《林海雪原》,就是我们宝贵的精神食粮。我们抓紧熄灯前的那点时间,几个人头碰着头,凑在昏暗的灯光下争分夺秒地看。一本书,你翻几页,我翻几页,生怕熄灯号一响,就没法看了。那时候,书是稀罕物,对读书有一种强烈的渴望。

如今我退休了,时间终于可以自由支配。手上的书,也变了模样。

我坐在沙发上,腿上盖着薄毯。大多数时候,我手里捧着的,不再是沉甸甸的纸质书,而是一个巴掌大的,发着微光的小本子——孙女教我用的,叫“电纸书”。

这电纸书,真是个好宝贝。我眼神不如当年了,看纸质书久了就眼花。这电纸书,字体大小能随心意调节,背景光柔和,一点儿也不刺眼。更妙的是,它肚量大得惊人。成百上千本

书装进去,比我当年一个军用挎包还轻巧。我年轻时想读而没条件读的那些“大部头”,像《资治通鉴》《战争与和平》等,如今都在这个小板子里,随时听候调遣。

指尖轻轻一划,一页就翻过去了。没有纸张的哗哗声,安静得只剩下窗外的风声和暖气的嘶嘶声。和当兵时那种紧张的、狼吞虎咽的阅读截然不同,此时此刻,我更感到一种从容与沉漫。

有时候,眼睛实在乏了,我就点开手机上的听书软件,闭上眼睛,戴上耳机,把沙发靠背调低,听《史记》里的纵横捭阖;听《红楼梦》里的婉转凄美。专业的播音员,声音浑厚、情感饱满,比我自己默读有滋味多了。屋外寒风越是凛冽,那耳机里的故事就越是清晰,越是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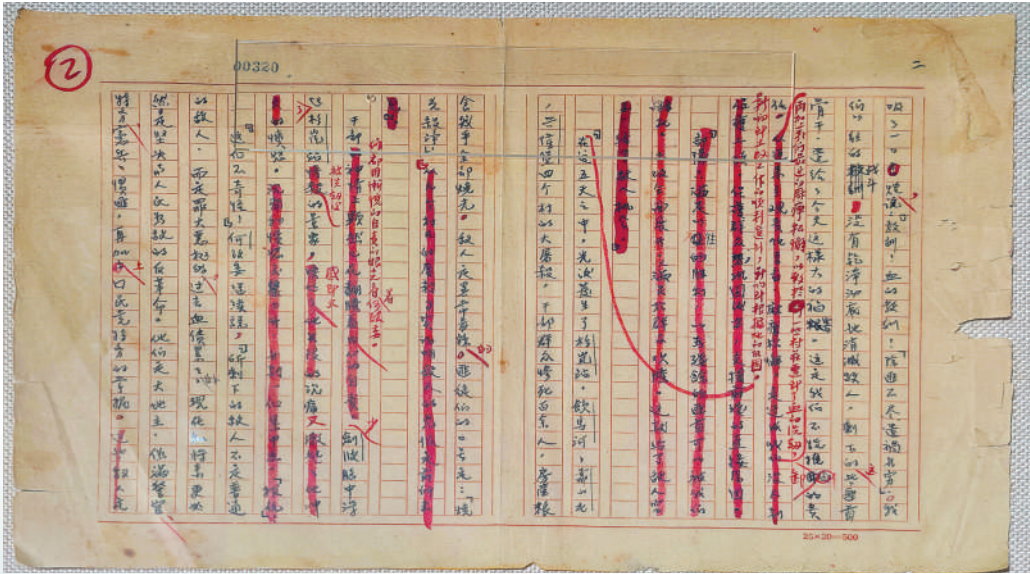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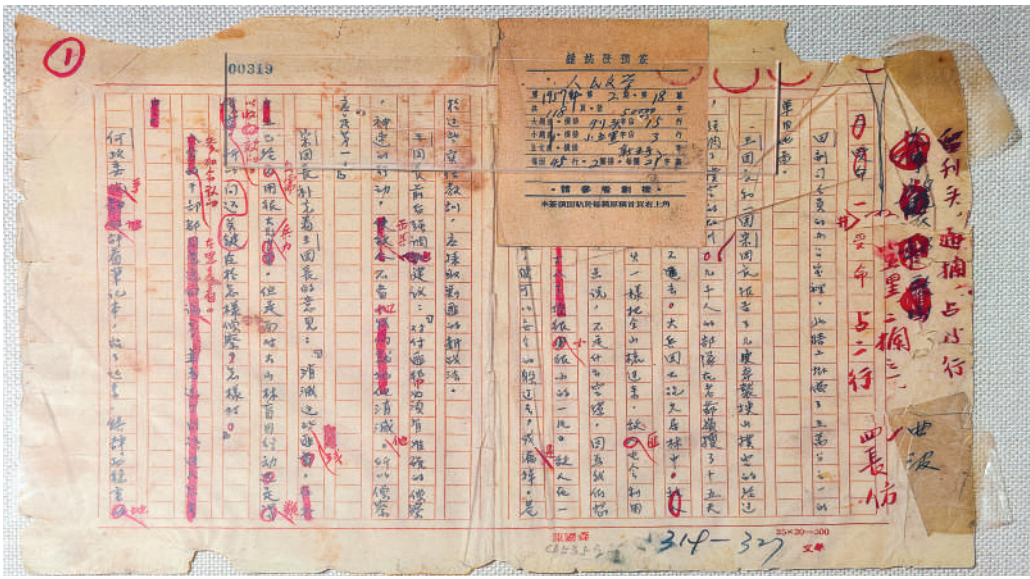
新科技的到来,给我的晚年生活增添了莫大的乐趣。它让读书这件事,跨越了纸张的局限,甚至让我摆脱了老眼昏花的困境。

当然,我没有完全丢掉纸质书。书房里那几排书架,还是我倾心的地方。我总觉得,纸质书有它的气韵,那是墨香与时光混合的气息。电纸书方便,纸质书厚重。在冬日的午后,我常常依据当时的心境与状态,选择合意的阅读方式。

《小窗幽记》中有句说得:“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对我而言,无论是年轻时在风雪军营里读那些已被翻破的书本,还是如今在暖气房里读电纸书,都是在寻找一方净土。外面的世界天寒地冻,我的心里却热气腾腾。这冬日里的读与听,便是我踏实、温暖的心灵栖所。

## 视觉阅读

### 《林海雪原》手稿



1945年日寇无条件投降后,为了占据东北,蒋介石一面将数百万国民党军推向东北战场,一面收买伪满官吏、宪兵警察、盗寇匪徒等,组成号称“中央先遣军”的土匪武装配合作战,致使我军处于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困难环境中。

1946年冬,在牡丹江周围的林海雪原里,原牡丹江军区二团副政委曲波和他的战友们与匪军展开战斗。1955年,曲波根据自己和战友们东北剿匪的亲身经历,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林海雪原》。1957年,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品讲述了解放战争初期一支由36名侦察兵组成的解放军小分队,在东北牡丹江地区与敌匪斗智斗勇,历经艰险终于获胜的故事,塑造了少剑波、杨子荣等解放军官兵形象。小说出版后在全国引发巨大反响,并被多次改编为戏曲、电影、电视剧等艺术形式进行传播。

(王艾涛摄于中国现代文学馆)